

文章编号: 1000-0690(2001)03-0230-06

# 清代科尔沁农耕北界的变迁

乌兰图雅<sup>1</sup>, 张雪芹<sup>2</sup>

(1.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 北京 100871; 2.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北京 100101)

**摘要:** 根据清代对蒙政策及其对蒙旗土地垦殖的影响, 结合当时科尔沁建置的时空特征, 恢复了清代科尔沁土地垦殖典型时期的农耕北界, 发现: 清代科尔沁农耕北界具有两次显著的北跃。其中, 农垦的第一次扩展是在 18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的“请旨招垦”时期, 导致农耕北界从清代初期的“柳条边墙”北上至今长春-四平-昌图以及敖汉、翁牛特旗南部, 哲里木盟东南部、卓索图盟大部以及昭乌达盟南部变成农牧并举、以农为主的交错区。农耕的第二次发展是在清末时期, 农垦推到洮儿河下游及西辽河两岸地区, 此时的农耕北界北起黑龙江大庆县, 经白城西、通辽北、开鲁县到林西县。今吉林省西部、辽宁省北部以及西辽河沿岸地带发展成为以农为主的农牧交错区。事实证明: 清朝对蒙政策及其变化是导致科尔沁农耕北界跃变的主要驱动因子之一, 是科尔沁农牧交错区形成的重要人文条件。

**关键词:** 农耕北界; 清代; 科尔沁; 垦殖; 建置

中图分类号: F319 文献标识码: A

科尔沁在真正的意义上是指科尔沁蒙古族部落, 后逐渐成为该部落所分布的嫩江两岸和西辽河流域及其周围地区的代名词。所以, 清代的科尔沁是指今科尔沁沙地及其以东的广大平原地区, 其东界为今齐齐哈尔西-林甸-大庆-肇东-哈尔滨西-扶余-长春-昌图-开原-彰武, 分属当时的内蒙古哲里木盟、昭乌达盟和卓索图盟<sup>[1,2]①</sup>。

清代是科尔沁近几个世纪以来首次农耕文化出现并不断拓展的转折点, 是现代科尔沁农牧交错区形成发展的起始点。目前, 对清代科尔沁的农业发展和农牧交错区的形成尚未有一个共同认可的解释<sup>[3,4]</sup>, 但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带历史时期的迁移规律和农耕区扩展的宏观研究表明<sup>[3,5,6]</sup>, 在自然条件允许的范围内, 民族迁移、开发政策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等人文因子是交错带扩展、迁移不可忽略的影响因子。鉴于此, 本文试从清代科尔沁土地开发政策入手, 结合科尔沁垦殖的出现、发展以及建置的变化来分析清代科尔沁农耕文化的推进模式, 进而重建清代科尔沁垦殖典型时期的农耕北界。

## 1 清代科尔沁垦殖的出现及其扩展

清代哲里木盟地处内蒙古东部, 面积之大为东三盟(即哲、昭、卓盟)之首, 是科尔沁蒙古族集中分布的草原地区。又因科尔沁部落归清早, 与满清贵族之间的联姻多, 所以清朝对内蒙古蒙旗土地(简称蒙地)所采取的政策及其演化在此得到了最为充分的体现。现本文结合清代对蒙政策的演变<sup>[7]</sup>及其影响体现, 以哲里木盟为例, 就科尔沁农耕的出现和发展试论述如下。

### 1.1 顺治元年(1644年)到乾隆十二年(1747年): 蒙地垦殖的出现

在科尔沁, 早在顺治年间就出现了垦荒现象。当时科左前旗就有公主陪嫁户在秀水河(即今秀水川——作者注)一带垦种<sup>[1]</sup>, 但由于清朝的封禁政策, 整个蒙旗仍处于以牧为主的经济状态。清统治者为了保护祖先的发祥地, 隔离蒙汉民族, 迁都北京后的第 12 年(即顺治元年)便下令: “各边口内旷土, 听兵垦种, 不得往口外开垦牧地”<sup>②</sup>, 封禁了包括

收稿日期: 2000-05-09; 修订日期: 2000-07-22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9831080)和(49771006)联合资助

作者简介: 乌兰图雅(1967-), 女(蒙古族), 内蒙古库伦旗人, 在站博士后, 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与环境变迁。

① 清代哲里木盟包括今内蒙古兴安盟、哲里木盟科左中、后二旗, 通辽市和东北三省(文中界限以内)西部; 昭乌达盟包括今哲里木盟开鲁县、奈曼旗、扎鲁特旗, 赤峰市除喀喇沁旗、宁城县外的全部; 卓索图盟包括今赤峰市喀喇沁旗、宁城县, 辽宁省朝阳地区、阜新县, 河北省平泉县北部和承德、围场的一部分。

② 《清史稿》卷 120。

科尔沁在内的东北地区,禁止民人(即汉族人)越入“柳条边墙”以外地区(简称边外)开垦种地。

同时,出于稳定社会秩序、增加财政收入的目的,清廷有限制的开放了东北部分地区。顺治十年(1653年),清政府颁行了《辽东招民开垦例》,首先开放了辽东地区<sup>[8]</sup>。对蒙旗则采取了鼓励和引导开垦蒙地的政策。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康熙在他东巡途中“见敖汉、奈曼等处,田土甚嘉,百谷可种”<sup>①</sup>,就派人传教垦耕方法。但另一方面,为了控制“出边”人口,清朝通过发放一定数量的“印票”来限制着前往“边外”垦耕的汉人数量<sup>[9]</sup>。

也是康熙年间,由于满清贵族圈占土地而造成的大批破产农民和逐渐回升的人口数量,使“边内”地区出现了“人多地少”的紧张状态<sup>[10]</sup>。雍正时期和乾隆初期,山东、河南、河北等省连年发生的灾荒<sup>[11]</sup>和愈发尖锐的人地矛盾,终于引发了冒险“越边”的流民潮。到乾隆初期“印票”已形同虚设,成为一纸空文。实质上部分蒙地被开放,大量流民涌入蒙地,局部地区出现了零星农耕,科尔沁地区有了农业。但至此,蒙旗的农业仅为游牧经济的一种补充,传统的农业仍然停留于辽河下游的“边内”地区<sup>[8,12]</sup>。

1.2 乾隆十三年(1748年)到乾隆六十年(1795年):蒙地的禁垦

面对“印票”的失效和“越边”人口的剧增,清朝出于它对“越边”人口控制的目的,再次发布了一系列禁令,加大了“边外”地区的封禁强度。乾隆十三年发布“撤回民典地及禁止出典令”<sup>[9]</sup>,十四年发布“民人回籍令”,“徐令民人归赴原籍”<sup>②</sup>。乾隆十四年又下谕:“……嗣后将容留民人居住、增垦地亩者,严行禁止”<sup>③</sup>。“边外”垦种再度受禁。此后也出台了一系列有关民人“出边”的禁令,但所有这些并没能有效地控制内地民人的“越边”。相反,“出边”的民人数量越发增多,垦种的范围亦日益扩大。

受其影响的首先是沿边墙的科尔沁左翼三个旗和郭尔罗斯前旗(简称郭前旗)。到乾隆后期,农耕已达到科尔沁左翼三个旗南部。当时已有流民在科

左后旗昌图额勒克(今辽宁昌图)一带开垦耕种;在科左中旗东南部法库边门一带形成了74个流民农业屯;在科左前旗形成了长岗子、獾子洞、平顶山等7大村屯<sup>[1,7]</sup>。嘉庆初期竟达到前郭尔罗斯,在郭前旗沿伊通河、饮马河、雾开河两岸,自然形成了一片农垦区<sup>[1,9]</sup>。农业在沿“边墙”初具规模,“边墙”附近出现了为数不少的村屯及民人聚居地。

1.3 嘉庆元年(1796年)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请旨招垦

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郭前旗扎萨克恭格拉布坦,首例正式向理藩院呈请,愿“划出游牧之地招农垦种”<sup>④</sup>。嘉庆五年(1800年),清朝“准今民人耕种”<sup>⑤</sup>,并在长春堡(今吉林省新立屯)设长春厅,管理伊通河、饮马河、雾开河两岸四乡(沐德、抚安、恒裕、怀惠)的民人事务<sup>[1]</sup>。至此,郭前旗的蒙地开放得到了朝廷的允准,也迈开了呈请开垦蒙地的首步。清政府对郭前旗呈请的准旨,无疑树立了一个私自开垦蒙地的典案,等于宣告蒙地开始弛禁。嘉庆十一年(1806年),清在科尔沁左翼后旗昌图额勒克设昌图厅,管理该处垦地和科尔沁左翼三个旗的民人<sup>⑥</sup>。专门用以管理流民的机构的设置,成为蒙地一定规模的垦殖和流民的象征,标志着蒙地旗县并存局面的出现。

之后,各蒙旗相继进入了请旨招垦时期。到20世纪初年时,仅郭前旗招垦面积就达 $48.21 \times 10^4 \text{ hm}^2$ <sup>⑦</sup>,哲里木盟东南部5个旗共招垦 $121.86 \times 10^4 \text{ hm}^2$ <sup>[13]</sup>。垦区从沿“墙外”的不连续状态,发展成沿“边墙”的农垦区,在哲里木盟东南部形成了两大农垦区:其一在郭前旗,以长春厅为中心,沿伊通河、饮马河、雾开河两岸、松花江南岸分布;其二是在科左三旗南部,以昌图府为中心,沿辽河两岸直至新开河流域<sup>[13]</sup>。在这两大农垦区内,蒙汉人民混居,以农业为主、农牧并举,旗县并存。

1.4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到清朝灭亡(1911年):解禁招垦

道光二十年(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光

① 《康熙皇实录》卷191。

② 《清高宗实录》卷308。

③ 《清高宗实录》乾隆十四年九月丁未。

④ 关逢. 郭尔罗斯前旗蒙地开发. 前郭尔罗斯史料(第一辑). 吉林省前郭县史志编委会. 1987.

⑤ 《清仁宗实录》卷68。

⑥ 《奉天通志》卷57《沿革志》。

⑦ 文中的面积单位在原文中均记为“方里”,此处根据“杜心宽. 清代哲里木盟垦务及其土地关系. 内蒙古垦务研究(第一辑).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0. 269~300.”中的“1方里=45晌,1晌=10亩”换算而来。

绪二十七年(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国内社会矛盾更加激烈、财政愈益紧张。面对这一情况,多数致力于边政的人士把“开蒙荒”视为解决当时政治、经济危机的首选方法,并力求将其付诸于行动<sup>[14]</sup>。次年三月,迫于国际威胁和国内压力,清政府在“移民实边”的思想指导下推出了所谓的“新政”。“新政”在内蒙古地区具体实施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改变封禁蒙地的政策,放垦蒙地,通过税收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以期支付巨额赔款。蒙地从请旨私垦阶段进入官放圈垦阶段,拉开了全面开垦蒙地的序幕,宣告了清王朝禁垦蒙地政策的最后终结。

此阶段,哲里木盟的垦殖逐渐扩向北部科尔沁右翼三个旗和扎赉特、杜尔伯特、郭尔罗斯后旗等六旗。从光绪二十八(1902)年到清朝灭亡的10年里,哲里木盟又放蒙地约 $303.25 \times 10^4 \text{ hm}^2$ ,为此前近百年招垦总面积的2.4倍有余<sup>[19]</sup>。经过10年的放

垦,哲里木盟科左前旗、郭尔罗斯前旗完全变成了农区,其余地区则变成了半农半牧区,境内亦形成了两个农耕区;其一为集中于嫩江两岸的松嫩平原农耕区;其二为以洮南府(今白城市)为中心的洮儿河下游农耕区。

## 2 清代科尔沁的建置及其变迁

自蒙地出现流民以来,随着民人数量的增多,清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与蒙汉隔离政策相应的管理控制措施,其中最主要的一项便是旗县制的并行。即当在蒙旗垦耕的民人数量和开荒面积达到一定规模时,把这一部分人和地单独划分出来,设立为县(或府、州、厅),并使其归属相邻的农业省或其直接管辖内(表1、2)。清朝在蒙旗设置的府州厅县,不仅是蒙旗流民数量增多和蒙地垦耕面积扩大的见证,在某种意义上成为蒙地垦殖的时空特征记录。

表1 清代哲里木盟部分蒙旗放荒的土地面积及其所属县别 (万 $\text{hm}^2$ )  
Table 1 Statistics of permitted cultivated barren lands in Grim Aing in the Qing Dynasty

旗 别	土地总面积	放荒面积	从属县	从属面积
科左前旗	54.3	23.4	康平县等	23.4
科左后旗	171.0	94.5	昌图县 辽源县 康平县	57.3 2.1 35.1
科左中旗	630.0	126.0	辽源县 奉化县 怀德县等	12.9 41.7 44.4
科右前旗	248.7	175.2	洮南府 开通县 靖安县	55.5 40.5 24.6
科右后旗	118.8	55.8	安广县 镇东县	26.7 29.1
科右中旗	183.0	50.4	醴泉县等	50.4
郭尔罗斯前旗	240.0	126.0	长春、农安、长岭三县	126.0
郭尔罗斯后旗	153.0	93.0	肇州厅等	93.0
杜尔伯特旗	150.0	42.9	武兴、林甸二县	42.9
扎赉特旗	180.0	31.8	大赉、景兴镇等	31.8
合 计	2128.8	819.0		737.4

注:该表据《哲盟实剂》(王士仁,1913.1987年由哲里木盟文化处重印)整理。

卓索图盟、昭乌达盟由于地处内蒙古南端,与内地最为接近,最早成为流民便利的落脚点。在哲里木盟蒙地逐次开放的同时或更早些时候,该两盟已出现有流民并相继被垦耕、开放,民人进入沿“边墙”的喀喇沁、土默特一带,渐次向北推进。到乾隆十三年(1748年)禁垦以前,卓索图盟的大部以及昭乌达盟的翁牛特、敖汉、克什克腾等旗的部分地区,已有

民人从事耕种,两盟的府县等管理机构相继被设置<sup>[10,15]</sup>(表3)。

乾隆十三年(1748年),卓、昭两盟蒙地垦荒亦遭禁,但朝廷的三令五申依然未能杜绝内地流民的“越边”。卓、昭两盟的垦务反而更加兴盛,并一直延续到“请旨招垦”时期。到清末官放以前,卓、昭两盟16旗的大部可耕区已完成了向农区的转化,只有巴

表 2 清代哲里木盟部分蒙旗放荒时间(年)及建置情况

Table 2 Time of permitted cultivated barren lands and related organizational system of Grim Aing in the Qing Dynasty

原属旗	放荒时间	建置时间	建置名称	今属省区	备注
科左前旗	1822	1902	彰武县	辽宁	1813 年试垦, 1897 年开禁
科左中旗	1803	1878	奉化县	吉林	民国三年(1914)改为梨树县
	1821	1877	怀德县	吉林	今公主岭市
	1862	1902	辽源州	吉林	今双辽县
	1907	1912	双山县	吉林	今属双辽县
	1906	1909	醴泉县	兴安盟	今突泉县全部和通榆县一部分
科左后旗	1802	1806	昌图厅	辽宁	1877 升为府
	1802	1880	康平县	辽宁	
科右前旗	1902	1904	洮南府	吉林	
科右中旗		1904	靖安县	吉林	约今白城市
	1902	1904	开通县	吉林	约今通榆县
科右后旗	1906	1909	镇东县	吉林	今镇赉县的一部分
	1904	1905	安广县	吉林	今大安县的一部分
扎赉特旗	1899	1904	大赉厅	吉林	今大安县的一部分
郭前旗	1791	1800	长春厅	吉林	1889 年升为府
	1824	1889	农安县	吉林	1827 年设龙湾乡
	1906	1907	长岭县	吉林	
		1909	德惠县	吉林	

注: 据文献 1、11、13、14 整理

林二旗、扎鲁特二旗、阿鲁科尔沁旗以及敖汉旗的部分地区保留着草场和畜牧经济状态, 这些地区于清末“新政”时期的官放中又被开垦, 相关的管理机构随之被增设<sup>[15]</sup>(表 3)。到清亡时, 卓索图盟的全部

以及昭乌达盟的敖汉、翁牛特、奈曼等旗已完成了向农区的转化, 昭乌达盟的中部西拉木伦河两岸基本变成了以农为主的半农半牧区<sup>[10, 15]</sup>。

从最初蒙地的私垦到清末的官放, 建置贯穿着

表 3 清代卓索图盟、昭乌达盟部分蒙旗的建置情况

Table 3 Establishment of organizational system in Zhaowuda and Zhaostu Aing in the Qing Dynasty

设置时间(年)	名称	备注
乾隆五年(1740)	塔子沟厅	今辽宁省凌源县
乾隆三十七年(1742)	乌兰哈达巡检司	乾隆三十九年(1774)改为厅
		乾隆四十三年(1778)改为赤峰县
乾隆三十九年(1774)	三座塔厅	乾隆四十三年(1778)改为朝阳县
光绪二十九年(1903)	阜新县	今属辽宁省
光绪二十九年(1903)	建平县	今属辽宁省
光绪三十四年(1908)	开鲁县	今属哲里木盟(1905 年放垦)
光绪三十年(1908)	林西县	今属赤峰市(1905 年放垦)
光绪三十四年(1908)	绥东县	今库伦旗一带, 属哲里木盟

注: 据文献 1、10、14、15 整理

蒙地放荒放垦的整个过程。随着蒙旗垦殖的推进, 相应的府、州、厅、县不断增多并渐次升级(表 2、3)。只是, 在蒙地开垦的初期, 蒙地县厅的建置是被动的、无计划的, 是由流民人数的多寡和分布聚散程度来确定, 到“新政”时期则变成了朝廷主动的、有计划的进行官垦情况下建立的郡县网。

### 3 清代科尔沁农耕北界的变迁

#### 3.1 清代科尔沁垦殖推进的微观特征

清代科尔沁垦殖的出现和发展具有如下特征:

首先, 在整体上科尔沁的垦殖虽然是从沿“边墙”的蒙旗开始, 但其西部卓、昭盟的垦殖早于东部的哲里木盟, 而卓索图盟的开垦又先于昭乌达盟。到乾隆初期, 当哲里木盟刚刚有流民聚落地并出现零星农垦区时, 同属“封禁”区的卓、昭盟的民人及农垦规模却足以设置一个管理机构。乾隆五年(1740 年), 这种机构首次在卓索图盟的塔子沟成立(见表 3)。

其次, 从管理机构的设置可看出, 科尔沁东部的垦殖是持续的, 而西部两个盟的垦殖则集中于两个时段。在哲里木盟, 从最初长春厅的设置(1800 年)

到清朝灭亡(1911年),连续设置了近三十个府、州、厅、县(见表2),垦殖贯穿着禁垦、私垦和官垦的整个过程。科尔沁西部第一次大规模的垦荒集中于清初到乾隆时期。垦殖的扩展和流民的增加,使得该区在相应时期内设置了三个厅,其管理范围几乎扩展到整个卓盟以及昭盟的南部地区。随后的近一个世纪里,该区的私垦尽管一直在延续,但其速度及规模远不如该区前期或同一时期的东部,管理机构的设置几乎陷入停滞状态。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后的“新政”时期,西部两盟才进入第二垦荒高潮,此阶段又设了五个县(见表3),农耕北界推到昭盟中部地区。

再次,总体上科尔沁的垦殖是从“边墙”逐渐推向腹地的,但其内部仍存在着一定空间分布差异。科尔沁西部垦殖在它的第一高峰期间就遍布了卓盟大部及昭盟南部,但由于其山川交错分布的地理环境特征,农耕的分布相对零散,垦区主要集中于丘间低地、河谷两岸等地。在第二高峰期,当农垦推到西辽河流域后,良田连片的大规模垦殖才开始。科尔沁东部由于其广阔平坦的地势,垦殖从周边地区以时间上的持续性和空间上的连续性向腹地推进,农垦范围从点到面逐步扩展成四大农业区。

### 3.2 清代科尔沁农耕北界变迁的宏观过程

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垦殖,科尔沁农业从无到有,农耕北界从清代初期的“柳条边墙”推到科尔沁腹地。从科尔沁蒙地的垦殖过程以及建置经过不难看出,科尔沁农耕北界的推进具有显著的阶段性(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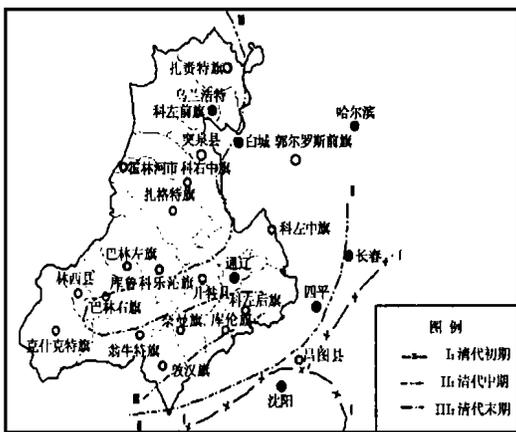


图1 清代科尔沁农耕北界的变迁

Fig. 1 Changes of the cultivation northern limit of Horqin region in the Qing Dynasty

清代初期,农耕仍停留于辽河下游的“边内”地区,“柳条边墙”成为显著的农牧分界线。但零星出

现的科尔沁农垦,却打破了持续几个世纪的单一游牧状态,招致蒙地的“禁垦”。农耕北界的首次北上发生于科尔沁的“请旨招垦”时期,以东部长春厅、昌图厅的设置和西部三个厅的建立及其管理范围的不断扩大作为标志,农垦推至科尔沁外围平原地区。哲里木盟南部和东部(今属辽宁、吉林的地区)、卓索图盟大部和昭乌达盟敖汉、奈曼、翁牛特等旗的部分地区成为农区或农牧混交区。

农耕北界的第二次北跃是在清末近10年的短时间里完成的。解禁后的蒙地在清朝“移民实边”的幌子下,遭遇大规模、掠夺性的垦殖,农垦推入蒙旗腹地。科尔沁沿西辽河、西拉木伦河一带则全部被开垦。此时,农耕北界北端已到洮儿河下游白城及其以北地区,并西南沿西辽河北岸,经开鲁直到西拉木伦河流域的林西。此时,库伦、奈曼以及翁牛特等旗的部分地区仍处于纯游牧状态。

纵观清代科尔沁的农耕北界变化,可以发现:清朝对蒙政策始终左右着科尔沁农耕北界变化的方向和幅度。尽管清代内地人口的剧增会引起一定的人口迁移,但清朝对蒙政策一直控制着前往“边外”的农业人口数量,进而影响着蒙旗农业发展的速度和规模,具体表现为相应时期蒙地流民管理机构的出现及其扩展速度的非均衡性。总之,清代对蒙政策及其变化是科尔沁农耕北界跃变的宏观调控因子,是科尔沁农牧交错区形成的重要人文条件。

致谢: 本文曾得到陈述彭院士和张丕远先生的指点,谨表谢忱!

### 参考文献:

- [1] 周清澍. 内蒙古历史地理[M]. 呼和浩特: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1994.
- [2] 张穆(那木云等译). 蒙古游牧记(蒙文版)[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88.
- [3] 张丕远. 中国历史气候变化[M]. 济南: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6.
- [4] 邹逸麟. 明清时期北部农牧过渡带推移和气候寒暖变化[J]. 复旦学报(社科版), 1995, (1): 25~33.
- [5] 王毓瑚. 我国历史上农耕区的向北扩展[J].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第一辑, 1981: 122~150.
- [6] 卢明辉. 清代北部边疆民族经济发展史[M]. 哈尔滨: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4.
- [7] 色音. 蒙古游牧社会的变迁[M].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8.
- [8] 景爱. 历史时期东北农业的分布与变迁[J].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1987, (2): 95~119.
- [9] [日] 田山茂(潘世宪译). 清代蒙古社会制度[M]. 北京: 商务印

- 书馆, 1987.
- [10] 王玉海. 发展与变革——清代内蒙古东部由牧向农的转型 [M]. 呼和浩特: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2000.
- [11] 景爱. 清代科尔沁的垦荒[J].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1992, (3): 155~ 173.
- [12] 李令福. 清代前期东北农耕区的恢复和扩展[J].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1991, (2): 111~ 132.
- [13] 田志和. 清代哲盟蒙地开发概述[A]. 哲里木史话[C]. 呼和浩特: 远方出版社, 1995. 157~ 174.
- [14] 乌云格日乐. 清末内蒙古的地方建置与筹划建省“实边”[J].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1998, (1): 15~ 22.
- [15] 薛智平. 试论清代卓索图盟、昭乌达盟的放垦[A]. 德力格尔. 内蒙古垦务研究(第一辑)[C].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0. 301~ 327.

## Changes of the Cultivation Northern Limit for Horqin Region in the Qing Dynasty

WULAN Tu ya, ZHANG Xue qin

(1. Department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Abstrac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Qing Dynasty policies towards the Inner Mongolian lands and its impacts on the cultivation, and the spatial-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organizational system in Horqin region, the cultivation northern limits of Horqin region within different stages in the Qing Dynasty are reconstructed.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the cultivation northern limit jumped northward twice remarkably in Horqin region in the Qing Dynasty. (1) During the early Qing Dynasty, cultivation still confined in the lower reaches of the Liaohe River, and the "Wicker Frontier Wall" became obviously dividing line between agriculture and animal husbandry. (2) The first leaping of cultivation northern limit occurred within the period from the late 18th Century to the early 20th Century, namely, the period of "Presenting memorial to the Emperor for Cultivation the Inner Mongolian Lands". The northern limit moved northward from the "Wicker Frontier Wall" to Changchun City, Siping City—the southern Aohen and Ongniut counties. As a result, the plain regions of the eastern and southern Horqin region transferred to the transition zone between agriculture and animal husbandry with the animal husbandry as the dominant style. (3) The second leaping of cultivation northern limit happened within approximately decade at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At that time, the Qing Dynasty adopted series of policies by which quantities of population migrated from inland to Inner Mongolia to cultivation. The result was that the cultivation range extended to the hinterland of the Inner Mongolian lands. The cultivation region pushed northward to the lower reaches of the Taorhe River Valley and both banks of the West Liaohe River. And the cultivation northern limit extended from the Daqing City, across western Baicheng City, northern Tongliao City and Kailu County to Linxi County.

Seen from the changes of cultivation northern limit of Horqin region in the Qing Dynasty,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the Qing Dynasty policies towards the Inner Mongolian lands had dominated the direction and amplitude of the change of the northern limit. These policies not only controlled the amount of agricultural population, but also influenced the speed and scale of th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Inner Mongolia, which demonstrated as the appearance and enlargement of migration organizational agencies. In a word, the Qing Dynasty policies concerning the Inner Mongolia were the major driving force for the changes of cultivation northern limit in Horqin region, and were the important human dimensional factor for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transition zone between agriculture and animal husbandry.

**Key words:** Cultivation northern limit; Qing Dynasty; Horqin; Cultivation; Organizational system